



# 老兵亲历的娄烦镇战斗

娄烦镇战斗是八路军抗战史上中外记者团现场观摩的一场战斗。抗战时期，国民党当局大肆散播“八路军抗而不战，游而不击”等谣言，对我军造成了不利的国际舆论影响。1944年4月，由中、美、英、苏等国记者组成的中外记者团将参观访问我抗日根据地。毛泽东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当即决定把握这一难得机会，做好外宣工作，打破新闻封锁，消除虚假宣传影响，提升我军国际形象及国际影响力。在战斗中，八路军对日作战的英勇事迹通过中外记者团笔头和镜头有效传播到全国、全世界，震撼了国民党反动派对八路军的造谣、诬蔑。

娄烦镇战斗于1944年9月23日夜正式打响。在战斗中，我的父亲赵廉洁领导的晋绥八分区二支队静乐县武工队配合作战行动。以下是父亲参加战斗的回忆：

9月22日天一黑，武工队和民兵就对静乐至娄烦间伪军据点进行了封锁，并同时组织公路沿线村庄群众破路，在公路上挖了上百条深沟，并把土扬撒开防止敌人回填。

夜里，武工队分四个小组，带领民兵在县城四面打枪放炮，炮是当年义和团打八国联军的土炮“筛子炮”，装填黄豆粒大的铁矿渣用火药打出去。武工队还把鞭炮点燃放到煤油桶里，伪装成是枪炮声，骚扰静乐城的日伪军。第二天，趁着敌人被周边骚扰搞得夜不能寐惊魂不定，武工队张福祥带领队员潜入城内小巷夜里捉了警察分局长，夜袭了南关警察局。早晨，日军中队长听说后如临大敌，下令全城戒严。

第三天拂晓，当敌人在城里戒严搜查时，在静乐县城外南边天柱山伪军炮楼旁，武工队李建华带着十几个人早已埋伏在隐蔽处。李三宝装扮成送水的村民挑着一担水走到炮楼的吊桥前，岗楼上伪军下来放下吊桥，李三宝过去就掏出枪顶住了伪军，李建华带着队员们跳出来箭步冲进炮楼，十几个伪军还没起床就被缴枪当了俘虏。队员们放火烧了天柱山炮楼，静乐县城的日军中队长立即派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赶往天柱山，可除了被烧毁的炮楼，连八路军武工队的影子也没见着。

连续三天，武工队通过封锁破路、四方造势、夜袭南关警局和火烧天柱山据点等行动，有力地骚扰和牵制了静乐县城日伪军，使其自顾不暇，无法增援娄烦，为我军围困攻克娄烦日伪军据点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4年9月23日夜，娄烦镇上空黑云密布，二支队各连利用暗夜静悄悄接近敌人碉堡区，连夜挖了野战工事。

娄烦镇东南靠河，北边靠山，日军一个小队驻守的大炮楼和营房就在北面靠山的高处，大碉堡外还修了4座小炮楼，各驻有伪军一个班。日军炮楼据点坡下百米外的黄土崖壁上，当地党组织和武工队动员的几十名有经验的挖煤工正在地下坑道中加紧作业，八分区派来工兵参谋和挖煤工一起不断校正着方位和水平角度。

天一亮，我军先开展政治攻势，拿着喇叭向伪军喊话，炮楼里的日伪军凭借坚固工事不断向我方阵地开枪射击，我军进行了还击。敌人发现我军坑道作业后，多次突击企图破坏坑道口，都被我军火力打得丢盔卸甲退回炮楼。由于守敌不断伤亡，士气低落，再加上我军不断喊话让伪军调转枪口，据点里的日军怕伪军投诚八路军，就不敢再让伪军出来反突击了。

我军围困着娄烦镇日伪军据点没有进攻，据点里的日伪军也据守不出，这种情况僵持着。可是在地下坑道里挖煤工们日夜不停争分夺秒地快速向前掘进，上百米地下坑道终于挖到了预定位置，爆破组安放好上千公斤炸药和导管拉线。

9月25日，据点里的日伪军仍在负隅顽抗。下午6时，支队长林海青一声令下，爆破组拉响了地下坑道中的炸药，随着轰隆的巨响，黑烟腾空而起，伪军的一个碉堡被炸飞，日军的大碉堡没有倒，机枪仍从碉堡向外密集射击。支队长林海青仔细观察发现，日军大炮楼出现了倾斜，并从上到下裂开一条大缝，炮楼里的机枪声也戛然而止。原来，爆炸使炮楼地基下陷，结构毁坏。林海青立即下令火力封锁压制，我军阵地密集的子弹射向炮楼开裂的大缝和每个射击孔。伪军见炮楼被炸、日军据点也没了动静，纷纷跳进封锁沟里逃跑。随着我军冲锋号响起，霎那间杀声震天，八路军战士们端着刺刀猛虎般冲向敌人，溃散的敌人纷纷缴械投降，娄烦战斗胜利结束。此战歼灭日军小队长以下20多人、伪军中队长齐占元以下280多人。

此时此刻，访问团的外国记者们正在不远处的观察哨里观察战地情况，记者们纷纷拿起相机拍照，激动地竖起大拇指说，八路军打仗既勇敢又机智，真是好样的！

娄烦战斗，充分展现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人民英勇不屈抗击并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抗战精神，它是气壮山河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诗中的一页不朽华章。

赵廉洁 回忆 赵志军 整理

# 檐角飞云处 曾闻唱经声

孙琨

## 【唱经楼】



唱经楼名列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位于太原市杏花岭区鼓楼街33号。唱经楼是旧时山西科考唱榜之处，建于明代初期，明清两代数次扩建重修。现存唱经楼和主殿为明代所建，春秋楼和通廊为清代建筑，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布局为不对称L形，在山西境内不多见，楼与正殿有明代建筑特征，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唱经楼(资料图片)

唱经楼，是以前科举考试公布成绩、张榜的地方，官员要在楼顶上将前几名的名字高声念出。清康熙《阳曲县志》载：“唱经楼，在布政司前，明布政刘曾重修。”短短的十几个字，将唱经楼的独特之处讲清了一半。

明代，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元朝之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成为明直辖地区。除京师、南京(明都城)外，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京师又称北直隶，南京又称南直隶，其两京(直隶)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为十五省。山西便是这十五省之一，其布政使司衙门设在阳曲县，即现在的太原市区。

将唱经楼建在山西最高行政长官衙门前，可见科举在当时社会的重要性。

科举考试曾经被戏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明朝科举是中国科举制度史上的鼎盛时期。它对乡试实行定额录取，让科举直接与国家的政治资源挂钩。各省举人的多少和变化，决定着各省在国家最重要的官位资源分配中所占份额的大小，成为当时朝野关注的重点。而各省三年一次的乡试，也就成为省最高行政长官的重要工作。

乡试每三年一考，逢子、卯、午、酉年举行。各省乡试正副主考由皇帝直接委派，在翰林、进士出身的部院官中挑选充任。监临官由本省地方主官充任。

乡试共考三场，每隔三天举行一场，每场实际持续三天。考试时间在八月初九、十二、十五日。考生黎明入场，对号入座，每场都是第一日入场，第三日交卷。考生入场后分发三支蜡烛，供这场考试使用。

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有了举人身份，就和普通读书人有了差别，可以入朝做官，即使不做官，也跟地方知县的地位相等。

第二年参加会试的时候，举人还有权坐朝廷派遣车入京。这种车上面插有黄旗，古代黄色是皇家专用，插有黄旗代表“天子门生”的含义。一路经驿站，住宿接待费用全部由朝廷给驿站拨付。朝廷还会给举人发一笔路费，作为鼓励，同时也减轻了赶考压力。

乡试各省录取名额都由朝廷规定。取中的举人被解送京师参加会试，故称解额。这个定额不是一成不变的，按各省人口、田赋这些硬指标，文风这个软指标修订。清代又增加了捐输，即掏钱可以增加名额，所以各省乡试录取人数，处于不断变化之中。

《太原府志》记载，明嘉靖年间，举行了15次乡试，太原府共考出举人258人、进士74人，每三年仅有20余人考中，科举难度由此可见一斑。

发榜前夕，主考、监临以下试官大员按官职坐于贡院大堂。当众拆封录取试卷并写榜。榜式横写，自第六名写起，留前五名位置空白。等到正副榜都书写完毕，再填写榜首五名，谓五经魁首，还有一种说法是五经魁首指科举时代五经试士每经所取的第一名。这两种说法至今没有定论，但无论哪种，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寅日(或辰日)清晨，贡院一改往日的宁静，鼓声大起。主考亲自将榜单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特备的黄绸彩亭内，轿夫抬起，如同地方主官出巡一般，仪仗前导，再增加后分发三支蜡烛，供这场考试使用。

## 一碗牺汤的底蕴

武瑞萍



太原盆地的伏天，土生土长的太原人心里总飘着一股特殊的香气，那就是捧着粗瓷大碗吃得冒汗的羊汤香。一般农历六月至八月，太原各区县的村镇多举办牺汤节，贡品羊宰杀祭祀后，会煮汤供村民分食，祈祷来年风调雨顺。这碗滚烫的牺汤，早已不是简单的吃食。当人们在仪式感里喝下第一口鲜，实则是与千年前的“祀与戎”完成了一场跨时空的碰杯。

太原羊汤、小店牺汤、清徐羊肉片儿汤、榆次杂割……潇河两岸的羊味盛宴，藏着农耕与游牧文明碰撞的印记。太原作为“襟四塞之要冲”，自古便是胡汉交汇的前沿。当牧民的羊群遇上农人的灶台，当马背上的剽悍融入田垄间的质朴，这碗汤便有了超越烟火的意义：它是草场与麦田的和解，更是“祀”的虔诚与“戎”的刚健在饮食里的沉淀。

如今各区县的牺汤节、羊汤节，延续的正是这种文化基因。人们围着汤锅举杯时，恰似古人为出征祭旗、为丰收酬神的聚饮，热闹的表象下，是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集体记忆。

太原的“祀”，写在晋祠的周柏与圣母殿的彩塑里。唐叔虞种下嘉禾，周成王亲临祭祀，修建的这座祠堂便成了三晋文脉的祭坛。千年间，祭礼声从未断绝：李世民游晋祠留下的碑刻受到历代文人墨客赞颂；桃园堡的悼园里，宋金大战中战死的王禀，至今仍备受百姓崇敬。太原100多处国家级文物，半数都与祭祀相关，蒙山大佛的法相、晋阳古城遗址的祭坑、窦大夫祠的碑刻……共同构成了一张铺展千年的祭祀网络。

这种虔诚并非虚无的仪式。它是对天地的敬畏，对祖先的追思，更是对“民惟邦本”的注解。就像牺汤里必须有的那把盐，不张扬，却让整个文化有了根基。

如果说“祀”是太原的魂，“戎”便是它的骨。这座九朝古都的每一块城砖，都浸着硝烟味。晋阳古城在冷兵器时代

的攻防战中，成了中原王朝的北大门；王禀死守太原城的壮举，写就“宁为玉碎”的气节；郭子仪单骑退回纥的智勇，狄青披冲锋的悍勇，更让这片土地的刚毅有了具象的注脚。

就连太原文人的笔下，也带着金戈铁马的气息。王之涣“黄河远上白云间”的豪迈，王昌龄“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壮志，哪里是单纯的写景？分明是这片土地的血性在诗句里的奔涌。这种“戎”，不是好战的戾气，而是危难时的担当，就像羊汤里那把辣椒，平时藏着温度，遇寒时便燃出一身热劲。

潇河静静流淌，把“祀与戎”的基因浸润到两岸的村落与生活里。三晋文化研究会李俊明会长提出的“五色文化”，恰是这种传承的当代注解：

古色的青铜古币上，能看到晋商与边贸的渊源，那是“戎”的战略地位催生出的经济智慧；红色的清太祖战斗事迹，延续着王禀式的不屈，是“戎”的精神在近代的回响；土色的非遗民俗里，背棍的舞步、唢呐的调子，藏着祭祀仪式的影子；绿色的潇河水，滋养着两岸的耕读传家，让“祀”的敬畏化作对自然的守护；墨色的书院私塾，则把“祀”的礼义、“戎”的气节，写成了代代相传的课本。

这碗汤还在熬着。当伏天的阳光晒热太原盆地，当汤的香气再次漫过潇河，我们该懂：喝下去的是鲜美，品出来的是“祀”的厚重与“戎”的刚毅。这，才是太原最本真的味道。

有人说，中国历史“一千年看北京，三千年看山西，五千年看山西”，太原“襟四塞之要冲，控五原之都邑”，不但印证其“山河之心”的军事地位，更是“祀与戎”文化的集大成地，深厚底蕴镌刻着华夏文明基因密码。锚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中华文明精髓，才能激活三晋文化，让古韵焕发新魅力。

## 山色四时映华章

蒋殊

知道的是，彼时开凿出的石窟只有位于后来被梁思成评价为“北齐造像最精”的天龙山石窟第2、3窟，这是大丞相高欢选中的风水宝地，也是他着力打造的佛教圣地。

这还不够，在这片海拔1370米的晋阳高地上，他又修筑了一座避暑行宫。遗憾的是，今天在天龙山已经无法觅到这片避暑宫的踪迹，据北汉广运二年(975)碑文记述，此官“犹秦之阿房、晋之虒祁、楚之章华、汉之未央”。单看这比喻，就足够华丽，足够宏伟，足够璀璨，足够辉煌。

高欢的避暑宫建成500年之后，文采风流的王庭筠冒着大雪来了，举目凝望，白茫茫的天龙山让他情不能已，挥笔写下这组《游天龙山》中的第四首。

从诗中可知，那时天龙山上的避暑宫已经消失了，因此他才说“人道高欢避暑宫”。避暑宫毁于何时？有记载



天龙山景色 李学军 摄

说五代时期，然而并不确定。想来，是陪同他的人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中伸手一指，告诉他那寒云直上三千尺之处，是曾经高欢的避暑行宫。

金代文学家王庭筠极善诗文。出生较他晚近40年的元好问很欣赏他，称赞其“诗文有师法，高出时辈之右”。这四首诗，记录于清末晋祠赤桥村地方文化学者刘大鹏编纂的《晋祠志》中，为王庭筠歌咏山水系列之作，诗句尽显大自然之美，当然更多的是对他天龙山胜景的崇敬之情。

一句“帝遣名山护此邦”，给予天龙山多大的敬意啊！他将天龙山理解为天帝所派而来，目的是为护佑晋阳这片大地。既是天帝派遣的山，当然便不同于普通的山，以至于山前的土地亦是丰盈的，僧人一赠，便是“四十双”。按照《新唐书》中记载，五亩为一亩，那么四十双就是200亩！豪气冲天啊！

而当他拄一根青竹杖行走在绿意盎然的天龙山中时，悠闲自得到一下觉得自己像极了出行时总会在杖上挂以百钱的晋代阮修，内心也充满每遇酒家便要畅快醉一次的快意。

王庭筠到天龙山，不只是飞雪的冬季，也不只是耕种的春季，还不只是清涼的夏季，还有色泽最具层次感的秋季。然而或许是秋日易悲，这首诗中没有了春日土地耕作的希望，没有了夏日清爽的惬意，也没有了冬日飞雪的豪迈，而是“年深寺废无僧住，满林西风栗叶黄”的荒凉与沧桑，悲秋心绪滚滚而来。

对于王庭筠的籍贯，似乎存在一些争议。有说法他是山西永济人，也有说辽宁营口人。还有一种说法，他的始祖是朝迁太原贤士王烈的32世孙，在曾祖一辈迁往辽东。但王庭筠来过太原是没有争议的，他的父亲王尊古曾任汾州观察通判，在此期间王庭筠必然常来看望父亲，而途中晋祠与天龙山等地的名胜与风光，也必然诱惑着他一次次前往，将春夏秋冬看在眼中，记在心中，写在诗中。

